

沙磁故事

在“七一”到来之际，本报特推出一期“七一”副刊，讲述发生在沙磁大地上的革命故事，回顾党的光辉历程，重温革命岁月，从中汲取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力量。



1944年，日军战力衰退，抗战进入尾声。正在全国人民期盼最后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遭到日军突袭，导致军队溃散，大面积国土沦陷，史称“豫湘桂大溃败”。桂林是日军这次攻击的重要目标，位于桂林的各种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桂林辗转迁往重庆，在沙磁文化区延续学术生涯。

地质研究所艰难迁渝

地质研究所是民国时期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地质学科研究部门，成立于1928年，成立后即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所长。由于创建地质研究所工作繁忙，李四光于研究所成立当年辞去了北京大学的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四光率地

质研究所从南京辗转迁往广西桂林。1944年6月，日寇沿着湘桂铁路南下，直扑桂林，桂林形势危急。事出突然，地质研究所的大多数人员都在各地开展地质勘测工作，来不及召回搬迁器材，李四光只得带领在所的七八名工作人员携带轻便物品仓促离开桂林，经过20多天艰难跋涉才到达贵州贵阳。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因旅途劳累，旧病复发，到达贵阳后便卧床不起。李四光只得一边安顿研究所，一边照顾生病的妻子。幸好，李四光的学生乐森寻在贵阳的贵州矿产勘测团工作，在他的帮助下李四光和研究所在贵阳万松阁附近的一座庙里暂时安顿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10月，贵州独山失守，贵阳也受到日寇威胁。李四光不得不携病中的妻子、率地质研究所再次起程，往重庆迁移。途经遵义，李四光拜会了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迁往在遵义，为躲避此次日寇兵锋，竺可桢也在考虑学校再次迁移事宜。于是竺可桢盛情邀请李四光携地质研究所随浙江大学一起迁往贵州湄潭。虽然李四光觉得一同迁往湄潭也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地质研究所已经接到中央研究院必须迁重庆的命令，行政命令不可违，因而只得拒绝了竺可桢的好意，在遵义休整5天后，又匆匆上路，前往重庆。

1944年12月，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到达重庆。中央研究院虽然下令地质研究所迁重庆，但是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办公场地和人员居所。李四光到达重庆后，只能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李四光的学生侯德封正在担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经他安排，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往于小龙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内（图1），才算结束漫漫北迁旅程，安顿下来。

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迁渝是当时地质界一件大事，立即引起了学界关注，《地质评论》专门刊发消息称：“近以时局关系，地质研究所年底迁渝，已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设办事处”。不久，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在沙坪坝召开，来自全国的200多名地质界学者参会，会上李四光众望所归，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一届理事长。

地质研究所迁入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后，因“人数过多，办公面积过小，颇形拥挤，而寄物之房屋，则尤为狭隘，且甚黑暗潮湿，空气不易流通，至不合卫生之条件”，一部分人员不得不在附近沙坪坝、磁器口等地租房居住，办公场所除了借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房屋外，还在重庆大学等处借房办公。1945年，地质研究所购买了沙坪坝正街167号一处西式洋房后，一部分人员迁到这里办公，办公条件才稍微有所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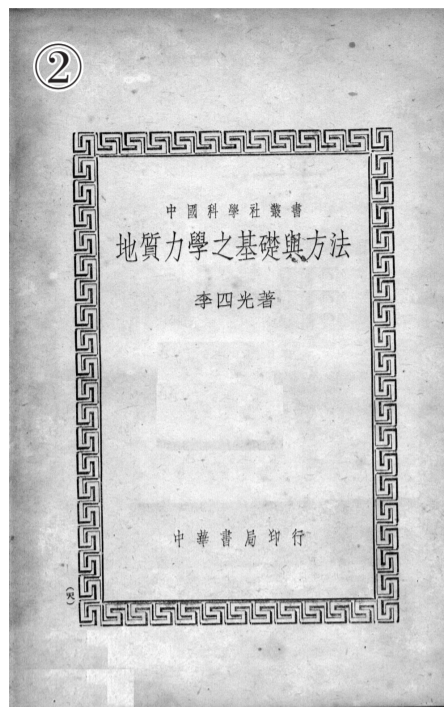
李四光最先居住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内，后来为了稍稍改善居住条件，经朋友帮助又在磁器口租了一栋小楼暂时居住。他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大学理学院一间研究室里开展，这间研究室是他的学生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俞建章为他安排的。地质研究所的工作则需要到小龙坎处理。因此，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经常忙碌地穿梭于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三地之间。

李四光创立地质力学

据俞建章回忆，“这次迁所时，由于人员早已散开了，又没有钱，又没有人帮忙，李先生（四光）受尽了千辛万苦，结果把身体累病了。”

1945年春的一天，李四光从沙坪坝前往小龙坎的路上突发心脏病，痛得直不起腰，无法行走。幸好重庆大学地质的助教周敏（即周明敏，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过，发现李四光病得很厉害，赶紧跑到学校把俞建章叫来，两人合力将李四光搀扶回家中休息。俞建章又赶紧到歌乐山请来心脏病专家张孝寿为李四光诊治。李四光经过张医生的细心诊治，又静卧疗养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才渐渐好转。俞建章回忆起李四光这段艰难时光，不免心酸，他说：“这一时期李先生心脏病发得很厉害，还有失眠症，李夫人患高血压病，高压200多。一间房子里有两张床，躺着两个病人，我看了后内心实在是很难过。”

但李四光即使在重病之中，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工作。当时，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地质力学方面，并且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他一边在重庆大学地质系的一间清静的房子里编写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图2），一边在地质系的试验室做地质力学中的泥浆模拟试验。常常忙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而不自知。到四五月间，他的研究基本完成，书稿也有了雏形。正好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邀请他去作讲座，于是他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以“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为题，分五次讲座分享给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师生。来讲的人很多，主要是地质系的师生，也有些对地质理论感兴趣的外系师生。李四光讲得非常投入，常常忘记了时间，有时一讲就是一个上午，中途都不休息；有时都忘了吃饭，直到一个专题讲完为止。主持人提醒他休息，他好像也



▲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四光编著的《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

听不见。当时他已经近六十岁，身体也不太好，但是讲到学术问题，一下子神情矍铄，仿佛不知疲倦，学生们都被他这种学术精神所感动。

讲座结束后，反响强烈，于是重庆大学将讲课整理成册印发，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开始传播开来。对于这次讲座，后来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他20多年来悉心钻研的成果，对建立地质力学学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讲座标志着李四光一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地质力学”走向成熟，地质力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诞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石油勘测队伍在松辽平原等地发现了一批油田，使中国摆脱了“贫油国”的帽子。

建议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

李四光在沙磁文化区期间，不仅学术上硕果累累，思想上也有巨大收获。1945年



▲1952年，李四光与周恩来在一起交谈。
▶1952年，李四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揭牌。

夏，李四光到北碚休养，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周恩来两次秘密看望了他。第一次看望，周恩来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政治形势，并叮嘱李四光多保重身体。“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第二次看望，“周恩来向李四光建议，把科学工作者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李四光非常赞同这个想法。”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李四光与竺可桢、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科技工作者100多人，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在沙坪坝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长由竺可桢担任，监事长为李四光，总干事为涂长望。中国科协总会设在沙坪坝，在西南、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分会，在美国、英国等也陆续成立了分会。一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以后更发展到几千人。（图3）

中国科协成立后，受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领导，成为统一战线领导和团结科技界人士的重要组织。关于它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协的发起人之一谢立惠这样评价：“当时的旧中国科协，就是为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服务，也就是为团结争取科学技术工作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政权，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也就是创造科学技术在我国发展的有利土壤”。南方局正是利用中国科协这一组织，将李四光等科技工作者从思想上紧紧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抗战胜利后，地质研究所人员逐步回迁南京。1946年，李四光将地质研究所沙坪坝购买的房子产权交给了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同年11月，李四光告别了生活、工作两年之久的沙磁文化区，乘船离开重庆，前往南京。新中国成立后，身居海外的李四光不顾国民党的百般阻挠，坚决回国，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成为第一任部长（图4）。



▲1952年，李四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揭牌。



▲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李四光旧居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旧址。

刘国鋳： 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为堪当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一文中指出，“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密联系的。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鋳，出生于四川一个富裕家庭，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特务劝他，只要交出组织、登报脱党，马上可以释放。面对劝诱，他斩钉截铁回答，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刘国鋳，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革命英雄人物代表。他是沙坪坝区党的干部，在沙坪坝的大地上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党史上伟大的篇章。

他1921年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世家大族。1940年在西南联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来到重庆，先后在南方局刘光同志、重庆市委委员彭永梧的领导下工作。1947年被任命为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负责领导沙磁区党的工作。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鋳被捕。重庆的特务头子徐远举认为刘国鋳“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少爷，不可能真搞共产党”，只不过是“青年人爱新鲜，喜欢赶时髦”，制伏刘国鋳不会有几个问题。但当特务们开始审问刘国鋳时，才渐渐认识到这个“大少爷”原来是块“硬骨头”。特务要刘国鋳交待党的秘密，刘国鋳只以一连串的“不知道”作答。特务转而直接告诉刘国鋳他的上级已经叛变，所有相关问题都已经交待。没想到这样的攻心奸计，对刘国鋳也毫无用处。刘国鋳反而报以冷笑，回答到“既然刘、冉（叛徒）二人什么都知道，你请问他们好了，又何必来问我呢？你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斗智失败，特务便对刘国鋳用上了老虎凳等酷刑。六七个小时的折磨，还是让特务一无所获。解放后，徐远举回忆：“刘国鋳居然在坐老虎凳时态度非常强硬”。敌人软硬兼施，均无法撼动刘国鋳的坚定意志，只得把他关入渣滓洞看守所慢慢折磨。

刘国鋳在渣滓洞关押时，对敌人没有半点屈服，反而还用他自己的反抗经验鼓舞难友们团结起来，跟特务斗争到底。狱中难友被他的事迹深深感动，反抗斗争也进行得越来越坚决。徐远举见他不但没有屈服的迹象，反而组织反抗，对他恨之人骨，不久将他转关到看守更加严格的白公馆看守所。1948年7月，特务将刘国鋳纳入了屠杀名单，以此威胁他放弃理想信念。刘国鋳面对死亡威胁也毫无畏惧。

乱人看死亡威胁也起不到作用，又无耻地利用起刘国鋳的亲属来，企图用亲情削弱他的反抗意志。徐远举允许刘国鋳的五哥与他见面。

见面之后，五哥看着刘国鋳苍白的面孔，褴褛的衣裳，心中又急又痛，话到嘴边，已哽咽难言，他说：“我们弟兄从小没有了亲生父母、相依为命，我这次专门回来营救你，指望把你早点弄出去，一家人团聚。”徐远举看到他们兄弟情深，趁机也说道：“过去我要你登报脱离共产党，现在也不要你登报了。只要你签个字脱离共产党，我就释放你。”

刘国鋳早已看出徐远举的阴谋，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行”。

五哥看到刘国鋳如此坚决，担心他的生命安全，止不住留下泪来，继续说道：“你就签个字吧！你怕什么？签个字出来，我立刻把你带到香港，然后再送你到美国去，一家

人也就放心了”。

刘国鋳兄弟几人，自小孤苦相依，感情特别深厚。看着五哥伤心的样子，他也不免跟着难受。徐远举看他兄弟两人难过的样子，以为奸计就要得逞，满脸堆笑。没想到，刘国鋳还是毅然站起身来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人对我的想念。徐远举真要释放我，何必要你亲自来呢？他是用你来要我的组织。你走吧……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真理是扑不灭的！中国革命一定成功！我自愿为人民牺牲自己。”

徐远举看奸计被看破，马上就叫特务把刘国鋳押走。临别之际，刘国鋳对五哥说：“给我送一张全家的照片来”。刘国鋳难舍对家人的眷恋，但也下定了牺牲的决心，要一张照片已经是与亲人诀别。这样坚定的革命意志，显然特务难以理解得到。徐远举因为这张照片，感觉又看到瓦解刘国鋳意志的希望。不久后，又派人提审刘国鋳，只要他签字脱离共产党就放了他。没想到，刘国鋳依然不为所动，而且更加坚决，他说“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朴素的几句话，完整地展现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1949年11月27日，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刘国鋳面对特务的枪口放声高呼：“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就义前，他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死而无憾！死而无憾！

刘国鋳的生命虽然定格在了二十九岁，但是他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英勇事迹却永远留在了人民心中。

在磁器口古镇金碧山下有一片崖壁，镌刻着“华子良脱险处”六个鲜红的大字。这是一处见证了渣滓洞、白公馆狱中党组织一次伟大胜利的红色革命遗迹。

“疯老头”华子良，是《红岩》小说里的重要人物，他的史实原型叫韩子栋，是白公馆看守所临时党支部的委员。1946年8月，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临时支部书记罗世文和委员车耀先后，党员同志们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反而是表现出了“善处逆境、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成立了由许晓轩任书记，韩子栋、谭沈明任委员的新一届临时支部，并决定将“越狱”定为狱中斗争的奋斗目标。在近一年的准备时间里，许晓轩、谭沈明、韩子栋分别制订了多套越狱方案。韩子栋因为经常随看守到沙坪坝、磁器口购买生活物资，计划利用到沙坪坝买菜的机会从重庆大学旁的中渡口坐渡船过江脱险。经过讨论，支部集体认为韩子栋的计划最容易成功，于是决定让韩子栋承担实施越狱、寻找上级党组织的任务。

1947年8月8日，韩子栋上身穿衬衣，下身穿短裤，头上戴一顶硬壳草帽，挑一副空担子，随看守卢兆春到磁器口进货。两人从白公馆大门出发，一路往东，经过童家桥，从幸福街进入磁器口市镇，沿着今磁正街询问行市，一直走到嘉陵江边码头，一如平常买菜。从江畔往回走的时候，韩子栋趁机会提出要回沙坪坝看看行情，准备实施从沙坪坝逃离的计划。但卢兆春怕热，不愿意再走沙坪坝。韩子栋只得跟着卢兆春往回走。两人没走几步，就在街上巧遇童家桥警卫便衣组组员胡为祥。胡为祥邀卢兆春到家里去打麻将，说话间又遇到白公馆医生王殿和离职警卫罗欢德，于是四个人带着韩子栋来到磁器口古镇西端的唐家院胡为祥家中打麻

将。四人上了牌桌后，留一名勤务兵在院中看守韩子栋。韩子栋拿出许多钱，请勤务兵去买个西瓜，于是勤务兵走开了。等勤务兵走远后，韩子栋装作上厕所的样子，从大门溜走。他先来到街口，准备叫一台滑竿，到中渡口去坐渡船。可到了街口，刚巧没有滑竿。他不敢停留，立刻改变计划向磁器口码头急行。到了江边才发现江水大涨，平时繁忙的码头没有一条渡船。但他并没有慌乱，而是按许晓轩的提醒，为防特务用警犬追捕，踏入江中，往上游寻找渡船。走到金碧山东侧文昌宫的断崖下时，他看到一只小船经过，连忙呼喊船夫靠岸，提价包船，渡江至江北，胜利脱险。韩子栋脱险后，又历经45天艰难行程到达解放区。找到组织后，他马上提出要见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汇报了渣滓洞、白公馆狱中组织的斗争情形。

韩子栋脱险是渣滓洞、白公馆狱中党员们共同书写的一段红色传奇。革命先辈们在沙坪坝的大地上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气，用生命去实践红岩精神的这些英勇事迹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精神伟力也必将鼓舞着沙坪坝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新沙坪坝建设中奋力前行。

（本版内容由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文字吴展渊）